



当代批评的 众神肖像

DANGDAIPIPINGDE
ZHONGSHENXIAOXIANG

牛学智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当代批评的 众神肖像

陈旭东 著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

陈旭东 著

陈旭东 著



当代批评的 众神肖像

DANGDAIPINGDE
ZHONGSHENXIAOXIANG

牛学智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 / 牛学智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039 - 5385 - 9

I. ①当… II. ①牛…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批评史—研究 IV. ①I20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7005 号

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

著 者 牛学智

责任编辑 吴士新

装帧设计 刘玲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421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5385 - 9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引 论

文学批评反过来被研究，就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史而言，我的阅读视野所限，也就是晚近些年的事情。就是说，对文学批评本身高频率的关注，是伴随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文学创作普遍的低迷而出现的。这就大致可以在时间上有个基本约束，文学批评被研究，我特指新世纪之交文学批评的研究。

当前文学批评的被研究，也不能一概而论。第一种是笼统的“价值论”，关注点一般与认为的某种低迷的创作现象捆绑在一起，批评文学批评的这不行那不行，其实总免不了连带着批评与批评同时而起的某种文学创作风潮；第二种是把批评当作本体来看待的批评话语及其演变研究，勾连一些社会发展史常识是这类研究得以推进的现实基础，我在书后“主要参考书目”中已经罗列了一些这方面较重要的研究成果；第三种是书写批评史，像古远清所作《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1949—1989 大陆部分）》（2005）那样，不全追求批评家个体思想的纵深，而主要在于通过典型个体拎起一段批评史发展流程；第四种是批评家研究，或批评家个案研究。这一种研究在现代文学批评研究中已有一些影响较大的著作问世，如温儒敏名为批评史，实则是批评家个案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2005），还比如夏中义的《新潮学案》（1996）、刘锋杰的《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2005）等等。但批评家个案研究在当前的状况显然不如现代，可也绝不能说没有人研究。白桦的《批评的风采》（1994）、王光明的《文学批评的两地视野》（2002）、支宇的《新批评：中国后现代性批评话语》（2008）等等，当然都具有首创之功。《批评的风采》到批评家雷达为止，描述了四十多位批评家，面铺得较宽，着力点不在批评个案的思想形象凸现上，主要以批评家的活动踪迹来带动一个时段的批评总貌。其它著作涉及批评家都很少，不是囿于流派批评，就是时间上比较早，都无法进入当前批评的纵深地带。王光明著作视野跨越大陆，涉及“两岸四地”，但论评对象其实多为文学史研究家，而且所选“批评家”的主要批评范围都集

中在某一段文学史上，对这些学者的研究深则深矣，就是总嫌面的过于狭小，忽略的显然比观照的多得多。支字著作开宗明义，论域就定在“中国后现代批评”，属于典型的风格流派研究。这便是我研究批评家，并且以刘再复为开头的主要学术背景。

刘再复在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史框架中的位置，毫无含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特别是其“启后”意义，早已是这段文学批评史人所共识的事实。而把“70后”批评家谢有顺放在最后，第一，我的排列不按影响力大小，客观上以年龄大小为先后顺序；第二，与下面要细说的“并列形态”有关，不同年龄段不同选择的批评，只要有突出的批评话语特色和滋生于并超越于某种批评共同体概念的个案，才具有双向建构功能——个体性话语建构和对整体性批评格局的积极促成，而不是因为有个所谓整体性批评格局，才依图索骥，说某个个体批评家在整体格局中的位置怎样怎样。这句话听起来像绕口令，其实它的含义很明确。

“性格组合论”、“主体性”这是刘再复最用力的地方，但这个用力也就基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有这方面研究的突出程度而言。他突出了的、在后来文学批评中依然大放光芒的地方，只能进行一次再度审视。所以，对刘再复的研究是有选择的观照，遴选而出的文学人性论批评话语可以视为贯穿全书的微妙线索，也可以视为观照其他批评家的基本学理底线。不过，在整个书写过程中，因时间跨度较大（前后跨度近7年），对不同文学创作风向和不同创作风格追求中文学人性态度，我本人也有一个不断修正、不断完善乃至进一步提高认识的过程。所以，所谓贯穿性完全是机动状态，即以不强制破坏论评对象的思想面貌为宜。如果我把选题定位为某某批评话语研究，主题也许会相对集中，但那大概就非常单调了，与近二十多年来整体批评格局的联系也就因缺乏必要的实证主义态度而很涣散，不是当下时代的文学批评了。受时风影响，直接凸显人性问题的批评话语，与通过外围研究远距离求证文学人性书写如何不能、使人性深研被迫搁浅的反面批评，就很难被真实再现。这就引出了首要的一个问题，怎样认知新世纪之交的整体批评格局与个体化批评呢？

批评家个案研究没有“史”的支撑，当代文学批评的整体形象也许会很凌乱；有了“史”的支持，批评家个体的批评思想脉络、话语特征就只能被打断。因为，相比较现代文学批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批评，的确不再是那么坚固，一般都在全球化，或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自我转塑。即便受教育相近的批评家，他们面对同一文学现象时的观照态度、论评选

择可能截然不同。如此一来,怎样搁置共同的“史”?又怎样安放个体思想的完整性?操作起来颇为犯难。迁就前者,批评家研究显然毫无意趣,那又与泛泛的价值论何异?完全封闭起来只看一个批评家,文章拉得再长、征引资料再丰富,又与一篇千字文的书评有何本质区别?

概括说,我选择批评家个案研究,其实最揪心的是怎样处理相对主义和“一元论”的问题。

既然我没有把成绩主要在文学史研究的学者,和主要情驻文学理论的理论家列到文学批评家行列^①,那么,我在这里所选的批评家实际上就具

① 目前来看,教授学者兼文学批评家的阵容最为庞大,其中有长期从事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有致力于某一体文学研究,反复钻探“纯文学”等重大理论问题,倾注地域文学、学术史、文化史、哲学思想史、民间文学文化、大众传媒文化等等的。他们有些已被不同版本的文学理论批评论著书写,有些也已构成当前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若以吴义勤、施占军主编的“e时代批评丛书”、作家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张学昕主编的由吉林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推出的“学院派批评丛书”的作者为例,人数已近百人。像“50后”、“60后”、“70后”、“80后”等庞大的作家群体那样,成绩显著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也分布在各个年龄段从事着各种类型的批评书写,如谢冕、洪子诚、黄子平、许子东、钱理群、王晓明、陈思和、王一川、王岳川、季红真、孟繁华、贺绍俊、程光炜、蔡翔、程德培、阎晶明、洪治刚、赵勇、吴俊、张光芒、何向阳、邵燕君、吴义勤、汪政、施占军、张新颖、王兆胜、陈剑辉、李炳银、王泉根、刘绪源、韩进、葛红兵、王光东、王光明、王宏图、朱大可、张柠、张闳、肖鹰、段崇轩、徐敬亚、陈超、张清华、陈仲义、周伦佑等等,只能暂时阙如。特别惋惜的是,本来陈思和、王晓明、黄子平、蔡翔、董之林等文本已基本全部细读,可是读完后又觉得他们的主要研究精力不是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就是在某个断代文学史上,比如“十七年文学史”,与本书意图并不合适,只能暂时不胪列。

批评家的另一阵容则是教授学者兼编辑,通过文学理论活动最切实推动文学批评发展的学者型编辑和编辑型批评家类型。这里所说的编辑职业成就的文学批评家,主要指文学期刊编辑,当然不止这些。一些省级文学期刊和重要大型文学期刊的主编、编辑虽然倾向于创作,或有些索性“述而不作”,但自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文学思潮运动中,他们通过设置相关栏目推介文学新质、推进文学发展本身,毋庸置疑是文学理论更具实践性的批评活动。此一点的有关详细论述可参阅批评家黄发有《媒体制造》和其他学者的一些“文学期刊”研究等论著、论文。至于那些分布在祖国不同版图的重要文学理论批评刊物的主编、编辑,如《南方文坛》的张燕玲,《当代文坛》的罗勇,《小说评论》的李国平,《文学自由谈》的任芙康、黄桂元,《扬子江评论》的丁帆等,《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的毕光明,《当代作家评论》的林建法等等。他们有些本身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文学史家,如丁帆、董之林等。有些在相关研究领域亦有重要著作行世。“春江水暖鸭先知”,没有他们理论批评家敏锐的慧眼去发现、组织,文学理论运行的重要话题,以及对于每个阶段出现的难点、焦点问题的讨论,恐怕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及时和活跃,我个人而言,他们的文学理论成绩,不单是能通过阐释编辑的某种职业精神能解释清楚的,涉及问题非常复杂,探讨他们的批评,既关涉当代文学史的整体面目又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刊物的深层运作密切相关,限于能力,这些成绩卓著的批评家或文学史家也只好暂时放下。

有了这样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紧跟文学创作的潮汐，能与创作理念同步并高出彼时创作实践，但还能把论评对象内在化地置于合适的文学史、理论批评史坐标打量，从中生发出自己个性化的批评话语的批评家。也就是说，所选批评家不见得是某种文学现象、某个文学创作潮流的发凡者，但必须是某种文学现象、某个文学创作潮流的沉淀者。相对主义作为价值多元化时代的一个模糊概念，在这里可做略微改动来用。即“相对于什么”，它“是什么”的表述方式。在相同文学创作时段，相对于一大批大同小异的批评话语，该批评家“是什么”的探究，就可以转化为，在一时段的批评话语共同体，或文学想象共同体中，该批评家的批评话语究竟沉淀了什么。对沉淀了什么的持续探讨，就是对该个体化批评话语的主题化、理论化过程。在文学理论新因素的发现上，该批评家的感受性主体话语，在心灵感应的层面联结着公共的“史”；在个性化表达的角度，这个公共的“史”又必然先完形于相对独立的个体世界。这是我理解的在相对主义概念下的“一元论”方法。没有“一元论”的表达自信，个体性话语完全会被“中西转换”、“中古转换”一类影响研究击碎；没有相对主义概念的转化使用，大的批评格局就无法呈现。如果个体批评家不在整体批评格局中，或者整体批评格局中看不出该个体批评家的显眼存在，那么，问题只有一个，该批评家的话语努力没有内在于时代文学的想象共同体中，并且他的主体感受性话语创造缺乏必要的反思性沉淀。这一方法也是我进一步避免观察同一批评家就同一文学现象发言时，因盲目动用比较法可能导致的“抑彼扬此”现象频频出现的一个表述底线。

当然如此警惕其来有自，一方面批评的多元化价值取向语境，同一文学时段的批评家之间很少有自觉的因袭关系，他们更愿意做一个“我来说”的首创者；另一方面，在共同受惠西方话语的大前提下，还存在谁的转化更妥帖、更深得文学现实支持的问题。这也是通常的比较法在批评家个案研究中不能冒然一用的根本原因。

这是我在个案研究中宁可选择概念和话语方式，而不以思想限定论评对象的最切实考虑。因为，一种概念可能对另一概念内含着冲击，一种话语方式也许意味着对另一知识范式的矫正。那么，从概念和话语方式进入，我所论评的诸多个案，实际上就是一个批评的并列存在形态。表面看，他们也许隶属于现代性、后现代性、启蒙主义、现实主义，或先锋派小说、“后朦胧诗歌”、女性主义文学、叙事学、感染力探究、身体修辞、自由主义文学、长篇小说、汉语诗性、否定美学等等分支。实际上，深入

进去，每个批评个体无不孕育着对所隶属范式的强烈反省和致命颠覆。流行的解构主义、文化研究，在他们那里的确仅仅是一种方法的适时选用，终极意图无不指向文学人性论的幽深地带。这时候，如果有效转塑一个个个性鲜明的批评话语，并把它们做一个主题化、理论化的归纳，个体角度，他们留下的是这个时代批评的差异性声音；整个批评格局而言，每一差异性声音又难道不是对一系列固定批评范式的“自反性”改进和发展吗？

近二十多年来批评话语变化之“快”、花样翻新之“多”，是人们深以为头疼的批评本体性问题。

单就个案研究要解决众多批评问题也许未必奏效，但经过远比18人多得多的批评文本阅读使我发现，批评话语变化之所以快、批评花样翻新之所以多，不能说与我们鄙视身边学者而舍近求远追逐域外理论资源有关。如果说这些个案已经对他们所历经的文学现实做了理论方面的话语凸显，并且这个凸显中也已经植根了他们的主体性创造。那么，他们批评话语方式所启示的方向，他们的批评概念所出示的问题意识，恐怕也应该构成我们检索为什么“快”、为什么“多”的题中应有之义。理想一点看，批评家个案研究也就能在不僭越个案体例的同时，实现了对近二十多年来文学理论批评价值标准混乱状况的理性判断。

至于说批评家个案为什么选择了这些，没有选择另一些，即为什么是此18位，不是彼18位？看起来是个根本性问题，其实选多少、选谁的问题，一般情况下都是伪问题，至少在我的这一个案研究中是这样。为什么呢？第一，要想使批评研究显得“完满”，就只好做批评史了；第二，选多少和选谁的问题，只要文学批评不会终结，它就永远是个争议的焦点，至少是名利者议论的口实。在这一点上，我坚持了我的固执。这个使我有勇气坚持的固执就是上面所说的批评话语成色和批评概念之发现。前者最是“心里的尺”（鲁迅）起作用的地方，后者也正好方便于衡量解构主义氛围中批评家对文学信念的确信程度。“心里的尺”在批评话语的创造上，表现为主体性感受能力；新概念对旧概念的修正、改写，表达着批评主体对流行批评话语、或习惯性批评话语的反复沉淀过程。自信一点说，我倒以为，立足于新概念的启动和批评话语的成色，一定程度的确适合于在价值多元化时代论评批评家的基本文学态度。

我曾试着在18位批评家个案研究中进行一些联结，使其构成一幅较完整的批评地形图，前后勾连、起承转合、丝丝入扣，形成一个前因后果脉

络清晰的批评流变图式。但实验的结果却很勉强，非但不能突出此批评家的特色，反而很容易模糊彼批评家的面目。找一找原因，大概是我选择的这些批评家除了少量研究领域是交叉的外，他们迄今为止的批评流程的确是构成了独立话语系统的。如果稍微放大一点，每一个批评家与此时整体批评格局，其实就是前面说的“相对于什么，又突出于什么”的关系。没有此个案，由彼个案来造成所谓整体批评格局，批评格局或许会更加难以把握；反过来，假如先想象出另一个整体批评形象，再从中析出适合营造氛围的批评个案，因个案与整体之间缺乏必要的积极冲突，个案反而不具有真正个案的性质。个案能否促成整体批评格局的建立，整体批评格局是否生成积极的个案，是我在具体研究中颇为费心思的一个节点。在衡估“相对于什么”时，能勾连起来的中外理论资源是参照背景之一，重要的是我不揣浅陋，大胆地动用了自己“心里的尺”——既然是观照彼主体的感受性话语，我作为一个主体自然不好自外于认同的话语方式，哪怕不能完全燃烧进去，点燃自己也是必然的。只有这样，处理“突出于什么”就有了一个比较学理的坐标。这个坐标就是先衡量该批评家的批评话语路径究竟属于自我创造，还是貌似创新实则包裹在流行话语、主导性话语的麾下问题。阅读了一大批批评文本，我的一个直观经验是，话语意识自觉的批评家即便有些篇章中思想不怎么突出，可能还是对某些常识的辨析，但汇总他的话语方向，其思想犹如陈年老酿，总会慢慢被品咂而出；而一些显然以思想抢位战姿态露脸的批评家，究其实质，因缺乏有力的话语系统支持，最终只能说喧嚣一时，骨子里仍是对某些已经被否弃的僵化思想的修修补补，呈现出的是看起来服服帖帖，其实批评性早已失去了必要语境支撑的“放之于四海皆准”的东西。说白了，研究批评家，特别是如今语境下的批评家，许多精力需要放在剥离影响的研究上，那么，处理得不好，整部书最后也许只剩了解构后的残余，那势必走向了个案研究的反面。为避免这个，目前为止我摸索的较有效办法，恐怕是得有点建构主义的企图在里面的。否则，那就真成了一盘批评的散沙。

所以，论评对象是不是大师？是不是大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拿什么突出于一般批评家的论述，以及他到底提供了怎样的视角和沉淀了怎样的文学理论经验。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一种有效的文学理论经验的出现，它不单是对以往文学理论惯例的突破，更是批评主体内在化了彼时政治经济学话语、社会学话语、哲学话语、民族学话语、人类学话语、消费娱乐话语等众多话语之后的文学性化合。这种努力一定意义上就超越了人

们常用来评价批评文字的标准——那种“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永远循环在低层次的所谓审美审视。这个角度，始终有批评“点”的批评家，或者不管文字游离多远总能回到他放心不下的那个“点”的文学理论家，总会让我内心为之砰然，于是也就投去了太多的敬慕。通观全书，如果有溢美之词，大约就因为这个。于是，我的尴尬也就显得异常突出。本来想着在纯粹中折射复杂，在复杂中塑造单纯，即把自己的目的定位在通过批评家研究最终通达文学理论基础话语的生成上去——个体化批评话语的理论化，哪怕不直接服务于具体文学创作，但必须含有内化文学创作理念、而为现有文学批评共同体的枯竭生成可资借重的文学理论基础经验的能量。不料，操作实践证明，你要是如此运思，你对批评家的研究就只能勉为其难地折腾在批评、文学史、文学理论相互交替、相互论证的庞大空间中，否则，非但整体性批评格局因权威文献的缺席而显出面目模糊的本相，而且个案也无以自立。这难道不又回到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四章“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早已阐述得一清二楚的优秀批评家的定义了吗？即“文学史家必须是个批评家，纵使他只想研究历史”^①。面对这样的难以让人不信服的论断，稍微可以获得一些许安慰的倒是，我所选的研究对象，鲜有人首先是文学史家，恰恰相反，他们作为批评家，十之八九都有挥之不去的文学史意识。也就是说，他们一般是在“历史”视野的大框架下，进行着各自的批评活动。所以，他们的批评话语建构，就多少具有了说得过去的多声部的味道。这是他们其中的有些人也许刚处在学术调整期，或正是批评生命的旺盛期，依然可以充当有意义个案的重要原因。

无数批评史著作已经证明，有些批评家虽一直占据着批评话语的高端位置，或经常领受着媒体镜头的强光照射，但他并没有如人所愿地贡献出可供后人“接着说”的批评话语成色。相反，“十七年文学”中当时并不出名的批评家，反而成了今天谈论某些文学理论批评核心问题时，无法绕过去的基础。这一层意思上，这部小书的性质，是不是可套用一個流行句式，表述为对“未完成的批评家”的研究？

至于，每一个个案研究中，批评家都说了些什么？都进行了哪些批评实践？我的文字梳理得是否清楚？把握得是不是过得去？那就是我的理论

^①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等译，第39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眼光和文字水平问题了，诚请关心本书的方家不吝赐教。另外，究竟选谁、选多少才算周详，我相信每一个悉心阅读过若干中国当代批评家文本的读者，对我的选择都会觉得是一个可以忍受的结果：选公认的最著名的（即便有，怎样衡量？）也总会有缺憾，选的人数再多几倍，挂一漏万的现象不可能不存在。

因此，现在的结果是，我索性按批评家年龄序列进行一些编排，使批评活动、批评思想稍微呈现出一些演变的“客观性”。年龄大小肯定不能完全对照批评主体的批评成绩，只是，我发现，在文学批评写作中，人们总是经常以“浮躁”、“着急”来说事儿，结合当前活跃程度特别高的批评家和批评趋向，仔细辨析，某些情况的确反过来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有些批评家的批评形象总是反复地、甚至“不厌其烦”地推到读者面前，究其批评观点的实质，除了体现批评家勤奋的阅读信息之外，批评话语的沉淀程度并不很高；而另一些“沉默”的批评家（或学者），目前看，穷其大半生的研究可能就那么几本著作，然而，正因为其研究始终在往深处走，视角始终围绕着某些个“要害”的点钻探，必然也就出现了方法论上提纲挈领的效果，从整体性批评格局来看，也就有了汰除、筛选，乃至使一段时间的浮躁、着急显出本相，使我们想要的方向感更趋于明朗的有效性来。把这些批评家的努力描述为以少胜多、以点带面，恐怕并不过分。

总之，不要把“个案”研究异化成“热点”研究，不要把批评家思想的追寻漫漶成对批评家批评活动的简单描述，不要把批评家量的积累完全看成是质的飞跃的直白说明书，或者，不要把二十多年后的写作直截了当地视为是对二十多年前的取代、革命，等等。那么，具体批评家个人问题史，一定意义上也就可视为对一个时段普遍性批评问题的凝聚。反过来，普遍性批评问题，只有放回到微观的批评语境，并通过这个语境，才能被具体感知到。这即是《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中表面看来按批评家的年龄序列编排顺序，实则每个个案论述都似乎有“从头开始”的原因。一方面固然说明近二十多年来的中国文学批评“深层结构”并不存在真正的“线性”时间观，另一方面也无妨说这是拙著自觉选择的一种论述方法。年轻人的文学观问题由谁来参照？抽象的“他者”中是否包括中老年人的视野？中老年人的价值观态度、审美情趣，是否内在于年轻时代或者年轻人？如此等等，相信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我宁愿理解成是“文学认同”问题。理想一点看，也就意味着我的这种方法论不过是为了更清晰地彰显同一时空下，“共同体”及“共同体文学批评”的问题。

目 录

引 论 /001

第一章 刘再复(1941—):重识“性格组合论”兼及文学
人性论批评问题 /001

第二章 雷达(1943—):文学主潮论与“时代主体”探寻 /017

第三章 王彬(1949—):将小说研究带进“微理论”时代 /040

第四章 胡平(1952—):感染力与批评的实效性 /059

第五章 王德威(1954—):通观视野与空间概念批评 /078

第六章 南帆(1957—):反抗常规与后革命转移 /102

第七章 耿占春(1957—):诗学社会学视野与诗歌批评话语 /124

第八章 陈晓明(1959—):从“后现代性”到“现代性” /144

第九章 戴锦华(1959—):“拒绝游戏”与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话语 /165

第十章 吴炫(1960—):“本体性否定”的原创性建构
及其批评实践 /193

第十一章 刘川鄂(1961—):自由主义文学的不倦阐释者 /215

第十二章 王彬彬(1962—):文学的心理人格论批评 /234

第十三章 李建军(1963—):人文精神烛照下的主体性批评 /254

第十四章 李敬泽(1964—):新总体论文体批评 /277

第十五章 郜元宝(1966—):完整性思想与“存在论语言观” /305

第十六章	王春林（1966—）：“个性化”理论背景中的 文本细读式批评	/329
第十七章	黄发有（1969—）：准个体时代的文学及其批评	/346
第十八章	谢有顺（1972—）：“70后”声音与批评的转向	/369
主要参考书目		/390
后 记		/398

第一章

刘再复^①（1941— ）： 重识“性格组合论”兼及 文学人性论批评问题

价值取向单一化的时代和众声喧哗的时代，在开始阶段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容易被学术命名。中国新时期初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就属于单一化时代被有效命名的文学现象；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以及“主体论”则属于众声喧哗时代的最为突出的命名者。而且这两种时代特点有一个根本性属性，单一化时代屏蔽掉的多元价值取向因沉入心灵底部，倒觉得符合个体感受性存在的性格条件；众声喧哗时代所“喧哗”的无非是政治意识形态所允许的东西，而属于只能由感受性主体发现的声音就仍然是被关闭或不得不沉默的。如果把追求实利和自我崇拜看做“喧哗”时代的“单一化”，那也未尝不可。对于文学及其理论，这种现象尤为突出，政治经济话语的实利、份额、利润最大化，转化到文学理论话语，就是“文化山”上热点、买点、看点的追逐，如果有人在此文化山上想要沉下去，就意味着被遗忘、被耻笑。不了解这一点，我们现在要谈论任何一个“沉下去”的命题，就无法拨开所谓“多元化”的干扰。

夏中义在《新潮学案》中对刘再复的总体性评价，被刘氏摘录在了他新版《性格组合论》的封底。其中说，思想史上有两类不同形态的经典：一是既敏锐地表征了某时代的民族或人类的文化意向，又达到逻辑自圆的

^① 刘再复，出生于福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9年出国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刘再复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文学创作。他的文学理论著作《性格组合论》是1986年十大畅销书，曾获全国优秀图书“金钥匙”奖。《论文学主体性》一文，曾引起全国性的讨论，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基础模式。他的学术著作还有《鲁迅美学思想论稿》《鲁迅传》《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传统与中国人》《放逐精神》，以及与李泽厚先生合著的长篇学术对话录《告别革命》。

学术名著；二是只敏锐地表征了某时代的民族或人类的文化意向，却未达到学术自圆的学术力作——但两者皆能对民族或人类的精神发展产生深刻的共时态乃至历时态影响。最后说，刘再复人文美学似属于后一类，因为，当后人想追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学界对人的思考时，就不能不读一点刘再复。80 年代中国学界对人的理解自然有多种论述，但刘再复的论述，特别是文学理论如《性格组合论》的话语方式无疑是“方法论热”中最系统的一种，虽不能说代表了 80 年代的人学观，起码也是对那时文学人学观最集中的论述，这也意味着，刘再复可算是一种文学批评的“终结者”和另一种批评话语的“开启者”，而他这方面的代表作毫无疑问是《性格组合论》。

《性格组合论》初版于 1986 年，再版于 2010 年，相隔 24 年。其间出版社连印 6 次，总印数超过 30 万册，这是指初版该书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刘再复在 2010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版本的“再版后记”里说这些话时是有些得意在里头的。所以，当钱钟书的提醒——“这说法可以了，显学很容易变成俗学给他的时候”，他写信给该社表达“适可而止”的同时，被推到理论的风口浪尖的心情其实并未一下子冷却下来。1988 年台湾新地出版社、1999 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分别对该著的重新出版，“转眼又是十年”还是刘再复比较在乎的一个时间概念。其实，从 1999 年到 2010 年，“又一个十年”，对刘再复来说又一次悄然到来，他隔岸观火，是幸灾乐祸还是早有预感？

保守些说，若把每十年看做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周期性反弹，刘再复重点开启的性格组合人性论体系，虽然不好用社会学的统计数据论证每一次讨论中的征引情况，但每一次讨论中所涉及的或深或浅的人性问题，无不围绕性格来展开。否弃典型论也罢，赋予非理性以合法性也罢，核心命题仍然不出人的可能性。

刘再复在讲这些出版故事的时候，他当然要表明的是这部专著的学术魅力，几个十年就意味着几种文学理论的轮番上演，可谓思潮涌动、批评迭起；也意味着几代批评家的新陈代谢、旋生旋死。如果不嫌烦人，再背诵一遍这期间的批评选择，那么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主体论、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他者”理论、文化批评等等，都是有幸被卷入的批评家不得不一试的时髦武器。如此批评线路，管你认可不认可、或者认可的程度如何，也不管一个坚持着的批评个体，还是整体批评格局，相信这样的—个批评流水线都会是一个有形的批评事实。也就

是说，当文学创作，尽管有时候与彼时的批评声音正好处于一种相反的较量、并由相反的叫板彰显作家对所想象接受主体状态的把握，也大致反映了文学叙事从重视人物淡化情节，到淡化情节突出身份，再由突出身份关注身份的文化属性到对文化属性归属感——民族性、本土性招魂的历程。那么，特别是相反声音的批评中所显示的，就绝不能说与文学创作基本理念毫无干系。在我看来，恰恰相反，别样的批评声音中的“别样”只是内在于文化批评逻辑的批判，而并不是超脱于文化批评思维的批判。这就导致在当前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整体上，创作与批评基本处于同一层面。关注点在于性格之外的文化，不是文化统摄下的性格。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值得一辩的问题，同是人和人的性格，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关注性格之外的文化，文化诉求压倒性格的抬头，如果把性格抽象为行动、意志、情感、情绪，乃至意识与潜意识状态，那么，民族文化、家族文化、本土文化、全球化文化、现代性文化或者后现代性文化等等个体之外的因素，就是文化批评的主要工作对象。即是说解构主义的三字经——“阶级、种族、性别”，转化成了文化批评“性格为何如此”式的追问。性格的应然，仍然是文化批评的对象，但不是进一步的研究对象。而重视文化统摄下的性格则显然不同，不管个体生存在怎样的文化语境，性格如果是体现人的本体处境的最突出特点，关注性格就意味着对“文学是人学”这个抽象概念的微观书写。具体一点，就是把人的情感波动、精神状态、非理性的合理性，以及连带而来的价值生活首先置于批评的首位的问题。这也是进一步看重文学对人本身态度，和把人当做研究对象之一的不同之处。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性格组合论》究竟产生过怎样的震动效果，回过头再重读一下那个年代“方法论热”、“主体论热”的相关论述便不难理解，“性格二重性”或“性格组合论”对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既有思维的矫正，肯定不是 30 多万册的出版数字能够量化得了的。2010 年重版的《性格组合论》，语境使然，这一次能否出现前一次的震动呢？或者换一个立场表述，这一次的主要阅读者将会是谁？解构主义批评家？文化批评家？还是作家？无法统计的所谓普通读者？抑或是出版者有某种针对性的策划行为？

总之，今天语境，怎样衡量《性格组合论》，实际上就是在今天批评语境中怎样理解“文学是人学”、人为第一位的问题。范围缩小到文学批评，它将关系到怎样看待文学，怎样选择批评话语的问题。当然，如果百分之百为“性格组合论”唱赞歌，肯定是一叶障目；像有些论者一样，仍